

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

许国栋

华人参政是二战后海外华人发展史进入一个新时期的特点，是海外华人经历三大变化的必然结果：一是华人落地生根观念已根深蒂固，认同所在国为新祖国的必然结果；二是华人抛弃重经济轻政治的传统观念，认识通过参政来保障本民族正当权益的必然结果；三是华人经济实力增强和社会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条件谈不上参政。

参政表明海外华人的公民自觉意识已完全确立，即意识到同所在国人民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并尽公民义务。这种意识的确立，使华人关注当地政局，参与当地政治，以国家安危为己任，为之效忠。参政使华人同所在国命运更加紧密地联在一起。

海外华人参政始自马来西亚，已有40多年历史。不仅组建了本民族的政党，而且参与执政。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有三大特点：一是华人通过组建本民族的政党而步入政坛。华人第一个政党马华公会，（全称马来西亚华人总公会），成立于1949年2月27日；二是华人并存三大政党，另两个政党是成立于1967年7月的民行党（全称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和成立于1968年3月的民政党（全称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三是三大华人政党分属执政党和在野党，并均加盟于以马来人政党为核心的阵线。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加盟以巫统为首的执政“国民阵线”，民行党加盟以四六精神党为核心的在野“人民阵线”。

华人组建本民族政党是由于马来西亚的政党均建立在特定民族基础上。率先成立的

是马来民族的政党巫统（UMNO），全称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成立于1946年5月。巫统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始终处于执政地位，并以巫统为核心形成巫、华、印三民族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国民阵线最终形成是在1974年6月。成员党包括马华公会、民政党和印度人国大党共十二个成员党。以马来人四六精神党为核心的反对党阵线——人民团结阵线，于1989年2月形成。成员党包括民行党、泛马伊斯兰教党、砂团结党等。这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基本格局，也是华人政治的基本背景。

马来西亚华人最早参政并非偶然，是由华人的两大特点决定的：一是马来西亚华人民族意识很强；二是马来西亚华人当地意识也很强。

马来西亚华人民族意识强，在海外华人中极为突出。重视华文教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把华文华语视为“民族的灵魂”，是沟通民族感情的桥梁。拿督郭鹤尧说：“华族本身的社群沟通，必须依靠华文华语。以母语为桥梁，彼此间的联系才有亲切感”。教总领导人林玉静进一步指出：“中华文化是华人的灵魂，必须受到极神圣的尊重。”^①战后华文教育虽几经沉浮，进入九十年代，全马仍有华小1200所，在校学生60万人；华文独中60所，学生54690人。在海外首屈一指。^②从1968年起，华人就力争创办华文大学，虽一再被当局否定，但仍力争不息，现

华社还拥有拉曼学院和南方学院两所大专院校。华人重视保留并发扬本民族文化还表现在设立诸多文化节日,如华人文化节、华文文学节、华文教育节、华人舞蹈节等。

当地意识即认同意识,自觉地把所在国当作自己的祖国。这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首先是华人为开发马来西亚所付出的汗水和辛劳极多。对此历任英驻马官员都加以肯定,如莱特上校称,“他们(华人)在开发马来半岛资源方面是最为活跃、最起作用的代表”。弗兰克·瑞天威总督称,“目前马来亚各个州之所以有今天,全靠华人的精神和事业”。日本学者李国卿也认为,“华人是马来亚矿业的开发者,是马来亚开发的先锋”。^③热爱这片国土,也是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再者,正因为华人对马来西亚有着特殊的感情,为保卫这片国土,也从不吝惜生命和鲜血。二次大战中当日军入侵马来西亚时,雪兰莪华人立即建立马来西亚第一支抗日武装——抗日军第一独立队。随后各地华人也纷纷组织起来抗战。日本侵略军因而特别仇视华人,据1946年9月英国韦尔德上校在东京审判战犯法庭上所说,马来亚华人被屠杀达15万人之多。^④正因为如此,华人对这片自己用汗水和鲜血浇灌出来的土地,也更加珍惜。战后华人又投身于独立运动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事业。另一个因素是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已繁衍生息数代人,扎根较深。据1947年的人口调查,在当地出生的华人已占华人总数的62.5%,已构成马来西亚华人的主体。^⑤

正因为当地意识强,战后华人领袖就积极鼓励华人加入当地国籍争取公民权,号召华人效忠马来西亚。1950年教总(华校教师联合会总会)和马华公会发表联合宣言强调,“我们生存的条件与马来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马来亚准备建国前夕,我们甚愿献身马来亚,为马来亚效忠”。^⑥马华公会创始人陈祯禄也号召说:“华人在政治上成为当地公

民,愿效忠本邦,以本邦为永久家乡。”^⑦

正因为民族意识强,华人才意识到必须组织起来,以谋求政治权利来维护本民族的正当权益,也保障自己能在这片国土上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为马来亚战后的重建和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1947年1月,《南洋商报》在社论中指出:“华侨的商业利益与政治权利分不开。没有政治权利则我们工商业随时可以被别人排斥,被别人侵犯……华侨工商界不能不关心当地政治制度。”^⑧陈祯禄在发起成立马华公会时指出:“组织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施以教育、训练和训导,发挥团结精神,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⑨特别是战后初期,马来西亚政局动荡,种族冲突频繁,华人处境令人不安。把华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已是刻不容缓,马华公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其主要宗旨是“培植和保障华人政治、经济、文化和福利,促进各族亲善”。^⑩马华公会的成立,奠定了华人参政的基础。马华公会是最大的华人政党,现拥有50万党员、2000多个下属组织。^⑪

二

华人三大政党目前均十分活跃于马来西亚政治舞台。40多年的历史证明,华人参政,其作用是积极的,取得许多突出政绩。

第一,劝导华人认同和效忠马来西亚。马华公会成立后在劝导华人取得马来西亚国籍,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效忠马来西亚方面做出了贡献。

马华公会成立时就表明以“促进华人团结与认同马来亚”为主要宗旨。^⑫陈祯禄在马华公会成立大会的演说词中说,华人要认同马来亚,“将这片哺育与滋养我们的土地铸造为一个国家,成为我们效忠、热爱与献身的对象”,又说:“我们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仍然是中国人,只是在政治上已成为当地公民,愿效忠本邦、以本邦为永久家

乡。”^③ 分会秘书黄九清甚至指出，“马华公会的一项原则是促进马来亚华人接受普通的马来亚国籍。任何会员违背了这项原则，必须予纠正，必要时开除其会籍。”^④ 由于马华公会的努力宣传和鼓励，在马来亚独立后申请入籍的华人迅速增多，从1957年8月至1958年8月，在大约近百万新公民中华人占80%，达74万人。^⑤

第二，引导华人步入政坛，提高华人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

马华公会于1951年8月同巫统领袖东姑·拉赫曼联手参加选举并获胜，从而登上政治舞台。1953年马华公会、巫统又同印度党结盟参加1955年大选并获胜，自此形成巫华印的政党联盟，是后来国民阵线的基础，马华公会也自此成为执政联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巫统把持政权并实施种族政治，但仍允许华人政党参政，而后也不能不允许华人反对党的存在。

华人政党的存在，华人在执政阵线中保有一席之地，这对保障广大华人的政治权利有积极意义。正如张晓卿所说，“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再通过参政的方式，才是我们华人求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团结合作，只有选择参政，才是最好的保障”。^⑥

由于华人政党活跃于政治舞台，整个华人社会对政治越来越关注，非政治组织的华人社团政治意识也越来越强，华人社会的三大社团之一——“董总”（全称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总会）明确宣称“坚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⑦

第三，维护华人正当权益，为华人谋福利。

马华公会成立伊始就致力于改善华人的生活条件，这是战争浩劫过后急待解决的问题。马华公会协助50万华人安置新村，发行福利彩票筹集经费，甚至因此被称为“福利团体”。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马华公会于

1975年创立马化控股公司，也申明为借此增强华人经济实力，“以期推动华人经济由家庭商业向大企业发展”。^⑧

维护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力是华人社团，由于马华公会上层大都来自受英文教育的阶层，对维护民族语言文化缺乏强烈愿望和深厚感情。因此在发展华文独中、创办华文独大以至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等问题上，均同华人社会相左，并成为马华公会同华人社会关系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华人社会强烈情绪的压力下，也表明支持独小、独中的存在，当1992年创办华文大学再次被当局否决后，马华公会发起创办拉曼学院以缓和华族情绪。所以马华公会在维护华文华语方面也起着一定作用。

民行党旗帜鲜明地反对种族政治，争取华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权益，并开展广泛宣传和活动。这对执政的巫统和处于执政地位的华人政党，无疑起着有力的鞭策作用。

第四，缓和马来西亚的民族矛盾，维护马来西亚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

加盟执政国民阵线的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在沟通华人与政府关系、调和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等方面发挥着直接作用。马华公会从一开始组建就以“促进各族和谐合作”、“保证与政府通力合作”为己任。^⑨ 华人执政的政党重视各种族间的团结，受到政府高度赞扬。马哈迪尔总理出席马华公会四十届常年代表会的致词中说，“马华公会对协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更稳定、更团结一致、进步和繁荣的大马作出许多贡献”。“马华领袖对多元种族国情事实所采取的中庸和务实态度，使国阵可以圆满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而不致影响国家的团结和稳定。”^⑩

民行党反对种族政治，主张建立“基于种族平等、社会和经济公平、服从国会民主制度下，追求一个自由民主的马来西亚”，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⑪ 以及提倡“两线制”的政治主张。这些努力对种

族政治是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对极端种族主义情绪是一种抑制,对执政党是一种鞭策和监督。这是从根本上维护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如果不加抑制地放任极端种族主义者任意侵犯占全人口50%以上被统治民族的权益,其结果必然激发种族间的矛盾与冲突,把马来西亚推入一个动荡不安的境地,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应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华人参政对国家民族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也应该指出,华人参政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最明显的是华人政党、甚至参政的政党都无法对政府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无法对政府推行种族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三

华人参政以来未能发挥更大作用,其原因客观上是受种族政治的困扰,主观原因是马华公会奉行妥协调和路线。

马来西亚是推行种族政治的典型国家。马来民族政党巫统利用把持国家权利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以马来人是马来亚“土地的儿子”(SONS OF THE SOIL)应成为国家主人,处于统治地位,享有政治经济的种种特权;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并施行以马来语为中心的体制。其他民族成为二等公民,处于被统治地位,民族权益受到剥夺和侵犯。这种政治局面决定华人政党的政治活动均围绕种族政治展开。华人政党间围绕如何对待种族政治而争斗,这就是三大华人政党并存且相互对立的根源。

而种族政治能够施行,同马华公会奉行依附巫统和调和妥协路线有直接关系。日本学者李国卿在《东南亚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一书中就如此评价,“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优先政策乃是在马华公会支持和妥协下展开的。”^①

巫统要在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

家推行维护单一民族利益的政治路线原已不合理,再加上马来人占全国人口不到半数,更缺乏推行这一政策的条件。正如1970年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长洲一二在考察马来西亚后的评论,“我们认为这种马来人优先政策确实不合理和难以苟同。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就不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②

正因如此,巫统要推行种族政治就必须得到其他民族,特别是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的华人的认可。拉拢华人上层造成联合执政的假象,这就是巫华印联盟组成执政阵线的背景。其实质就是把其他民族政党纳入推行种族政治的轨道,为巫统的政治路线服务。巫统也从不隐瞒它的政治目的。在1955年联盟刚形成时,巫统领导人拉赫曼就宣称,“马来人掌握政治上的优势,华人专事经济活动,印度人在劳工界表现实力。”^③其实种族政治施行后,所谓“华人专事经济活动”也成了空话,华人——特别是中下层华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利益受到严重的限制、侵犯和剥夺。1970年敦拉萨就任副总理时的致词中说得更明确,“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政府应跟随巫统的愿望和要求,并实施巫统所决定的政策。”^④明确要求其它参与执政的政党只能仰巫统鼻息,服务于巫统的种族政治路线。

问题在于马华公会领导人陶醉于这种实际上是附庸的执政地位,不是通过参政来改变或影响这种政局,而是奉行调和妥协路线来维护这种政治局面。1956年9月的中央会议上,把这一路线概括为“国家第一,政党第二,华人利益第三”。“只有在同巫统合作基础上,通过协商来争取华人利益。”^⑤华人利益实际上就成为它同巫统交易,保住参与执政地位的筹码。副会长林金狮说得更明确:“我们只能通过内部协商式在内部争取。为了顾及其他族群的感受,对于有利华社的事项也以低调处理。”^⑥这种不触犯巫

统利益为前提的协商,只能牺牲华人利益,以妥协为结果。所以何启良在“权威危机和协商困局”一文中指出,马华公会在政府中的作用,“只能缓和多元民族的社会与单元种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在大马政治权力斗争中处处显得被动。因而在马华社会缺乏公信力。”^③

失去华人社会的信赖是必然的,最后导致1990年大选中的惨败。对此香港《华人》月刊评论说,“马华公会作为最大华人政党所得选票,并非依靠华人而是马来人的选票”。

“表明多数华人背弃马华”,称之为“逐步游离华族之外”。^④而作为华人政党,失去华人支持就意味着丧失了民族政党的基础,如无根之草。所以大选后副会长林金狮惊呼,“由于失去华人支持,马华公会在执政党中的地位 and 代表性进一步削弱。”他形容马华公会的处境,犹如“走钢索的艺人”。^⑤实际上马华公会的民族色彩正在逐步淡化,巫统附庸的角色正在加浓。

马华公会原可以大有作为,更不必以成为巫统附庸来图生存。从四十年代末到整个六十年代,华人拥有许多优势。

第一,人口比例上,马来人不到全国人口的50%,华人将近40%,再加上印巴等少数民族,占50%以上。

1947年统计,马来人占49.5%,华人占38.4%;1957年统计,马来人占49.3%,华人占37.6%。^⑥这一基本情况表明实行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政治路线才是马来西亚的正确出路。作为第二大民族的政党,如能充分调动和团结华人,真正立足于华人民族,团结、联合其他民族,原可以为抵制种族政治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华人的经济实力地位。这比人口比例更拥有优势。

战后前期,华人占全国纳税人的70%。^⑦据1957年人口调查表明,华人在就业人口中,矿业占68.3%,锡矿占71.8%,制造业占

72%,商业占65.1%,建筑业占47.8%。早在1940年,大橡胶园的17%,小橡胶园的47.8%为华人所经营。^⑧这种情况意味着华人在战后经济重建和经济发展中将负有举足轻重的使命,这从华人资本的增长中也可以证实。1944年华人资本估计在1亿美元左右,1969年上升为3.45亿美元,到八十年代中叶已达100亿美元左右。^⑨

正如日本学者藏居良造于1957年研究马来亚问题后提出的论断,“马来联邦拥有两个在人口数量上大致相等的民族。他们各自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和互相孤立的领域,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新兴马来西亚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其命运取决于华侨的动向”。^⑩在他的评价中,华人对国家命运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战后华人政治热情已逐步高涨。

这在1946年反对歧视华人的新宪制斗争中已有所表现。进入五十年代又有进一步发展,1956年4月27日参加发起在吉隆坡精武体育馆召开的“争取华人公民权大会”的华人团体达454个。

甚至巫统发起人的首任主席拿督翁,都认识到推行单一民族的种族政治是不现实的。他于1948年12月召开各民族领袖联席会议,提出把巫统更名为“全马来亚统一机构”,成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多民族政党,以团结各族力量。当时正在筹备创立马华公会的陈祯祿也出席这次会议。虽然他的主张为巫统内部坚持种族主义立场的势力所不容,而被追退出巫统。但“启开了非种族政治的风气”,也是陈祯祿同巫统关系的开始。“马华公会转向与巫统合作,他采取较为偏激的态度以取得马来人的支持,被形势所促成回到马来民族主义政治圈子中。”^⑪

马华公会未能调动华人优势、立足华人社会,转而依附巫统,也陷自身于困境。马华公会之所以如此是由其阶级根源所决定的。

马华公会十六位发起人几乎都来自受英

文教育的阶层,这决定他们同华人社会较疏远,缺乏沟通。而且历届领导层均以大商人、企业家为主体。如在首届(1949—1951年)占63%,第二届(1951—1953年)占63%,第三届(1953—1955年)占79%,第四届(1956—1958年)占73%。至此马华公会的路线已完全定型。因而有“上层富裕华人组织”之称。^⑧发起人陈祯禄家族在独立前已是马来亚仅有的少数几家垄断集团之一。他的继承人、长期任马华公会会长的陈修信的森那美集团又是独立后马来西亚20家大企业集团之一。华人大企业家即使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通过他们同马来人上层的各种关系,其经济实力没有削弱反而有较大发展。如森那美集团到八十年代已列入大马23家大公司排行榜上的第三位,在本土以外的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00家左右子公司。^⑨华人上层同马来人上层有着共同利益,决定马华公会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四

当前,大马华人政治受如下问题困扰:

第一,三大华人政党并存,且分属对立的两个阵线,这是不正常的,弊病多。

一个民族可以有多个政党,因为族群有不同阶级和阶层,可以有代表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和意愿的政党,从不同角度来维护民族的共同利益。但当前华人三大政党都充当全体华人的代表,而互相对立和攻击。民政党虽同马华公会同处于国民阵线,均是执政党。但由于民政党的成员大都是从马华公会分离出来的,两党之间成见很深,也是同床异梦。这种局面,只能互相牵制和削弱,损害华人的整体利益。

另一不正常的现象是华人政党之间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又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却不能结盟,反而同马来人政党结盟。同处于执政地位的两大政党不协调,同处于反对党地位时也未能结盟。这是发人深省的问题。民

政党于1968年成立后,直到1974年加盟国民阵线前处于反对党地位,声明是多元民族政党,主张民族平等。这同民政党的主张基本一致,但始终未能结盟。对此《亚洲周刊》在“多元种族政治路途艰辛”一文中评论说,“民政党多年来尝试联合其他目标相近、奉行多元种族路线的政党,已遭重重困难,党的斗争也蒙受一些挫折。”^⑩终于放弃反对党身份加盟国民阵线。这对两党都不利。民政党的影响力也趋下降,特别是1990大选失利,结束了在檳城执政20年的历史,表明华人政党的不成熟,小团体观念重而全局观念差。

在马华公会公信力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民政党日益受到华人社会的关注和支持。1990年大选前夕,前董总主席林晃升等26位华社知名人士的加入,体现华人寄予厚望,也是当前最为活跃的政党。1990大选前民政党采取两大举措:一、加盟四六精神党的反对阵线——人民团结阵线;二、提倡“两线制”的政治主张。这两大步骤确实一时壮大了反对党的声势和影响,但没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大选中也没有重大突破。因为这两大步骤引起华人社会的疑虑。

“两线制”实际上是引进西方的两党制,是否适应东方的政治传统,对此华人和马来人都不敢轻易认同,正如《华人》月刊评论所说,“没有马来人族群的认同,两线制是脱离政治现实的。许多人进而论证,欧美国家两党制的成功不等于在亚洲国家亦能成功”。^⑪至于加盟四六精神党的人民阵线,因四六精神党是原巫统党内权力之争的产物,是由原巫统分离出来的。它并没有抛弃巫统的宗旨而是要恢复原巫统成立时的精神、旧的传统(巫统成立于1946年)。所以巫统和四六精神党被称为“这枚铜币的两面”。^⑫这是华人的疑虑之一。而加盟人民阵线的另一主要成员党泛马伊斯兰教党,由于吉兰丹执政的伊斯兰教党宣布政府将引进伊斯兰刑事法,并受到四六精神党的支持,这

不仅引起华人也引起印度等非伊斯兰教民族的疑虑。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人民阵线各成员党代表着不同民族的利益,缺乏共同基础,难以形成始终不渝的共同纲领,能否成为长期的联盟还是个问题。国民阵线因此而嘲讽它是“乌合之众”。^④

上述情况表明民行党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政党,无法取代马华公会,也未为华人社会所完全信赖。目前,“华人社会不把命运集中托付给一个华人政党”^⑤,三大政党并存局面还会继续下去,仍然成为困扰华人政治的问题。

第二,华人的团结,是当前华人政治面临的另一问题。

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1971年出席福建同乡联合会时说,“不团结是我们华人的基本弱点”,“华人虽然约占我国人口的40%,但如果他们不改掉过去那一种一盘散沙的不团结的恶习并积极关心政治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发挥其政治影响。”^⑥这段话确实反映了华人政治存在的严重问题,但马华公会恰恰应为华人的不团结负主要责任。

华人不团结的两大因素,一是三大华人政党并存且相互对立;二是华人政党同华人社会关系不协调。而这两大问题均与马华公会有直接关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同华人社会关系不协调。独立以来,华人社会为维护 and 争取民族权益的一系列重大斗争,马华公会不仅没有给予支持,而且站在对立面。其中如1965年反对全国华人注册社团联合会关于提高华文具有官方地位的提案;1968年反对由董总发起的争取创办华文独立大学的提案;1971年反对华人大团结运动基础上成立的“大马华人促进团结委员会”

(又称华团联委会)注册以及1975年反对华人对“工业协调法令”的抗争等。八十年代,这类对抗异常发生。马华公会这些做法不但使它不能成为凝聚族群力量的核心,而且使它同华人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甚至对

立。这对华人族群是一大损害,也削弱了马华公会作为民族政党的实力地位。当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不仅是一支高度组织的队伍,而且已是一支有巨大潜力和活跃的政治力量。据1980年6月吉隆坡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字典》提供的数字,州级社团达836个。据1989年马《光华日报》称,全马注册的华人社团达5000多个,加上宗教、福利社团和神庙理事会,华人社团总数有2万左右。^⑦进入九十年代,华人社会形成三大全国社团以统率这支浩浩荡荡的社团队伍。代表华人社会领域的是全国中华大会堂联合总会;代表华人经济领域的是全国中华工商联合会总会;代表华文教育领域的是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总会,即董总。这就能更加协调华人社团的步伐。自七十年代马来西亚强化种族政治以来,华人社会政治热情日益高涨,非政治组织的华人社团日益表现出不超越政治的立场。1972年2月开展了促进华人大团结的运动。1978年再次力争创办华文独立大学,在呈请领袖的请愿书上签名的社团达4000多个。1985年全马28个有影响的社团集会发表联合宣言,提出“以民主人权为依归,冲破种族界限”。要求“保障华人权益,废除土著与非土著区分”。1986年根据联合宣言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1989年全国15大华人社团再次发表“全国华团宣言”,提出“关于1990年后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观点和建议”草案。1991年中华工商联合会召开大会,通过呼吁政府“遵循不分种族、消除贫困、促进全民团结”的提案。1992年全马第二届华人经济大会通过呼吁政府废除土著与非土著区分的决议。^⑧

华人社会的政治热情日益高涨,而华人政党却未能凝聚这支政治力量配合政党的努力。正如吉打州中华大会堂会长拿督植廉贵所说,“政治运动的路线和华团运动的路线”,形成“两条大平行线”,未能汇成一股力量。他呼吁,“各华人为主的政党,面对各

项社会性和国家性的课题时,放弃个人恩怨,以民族和国家为重,主动遵循华社意愿,朝野政党和华团保持密切联系,寻求一致步伐,共商对策。”^⑤全国华团文化工委主席张景良也呼吁,“马华公会作为一个华裔政党应主动加强与华社联系,成为该党的职责,列入议程经常检讨和实行。”^⑥

第三,华人政治的主要弱点是政党不成熟,缺乏素质高、有威望的政治领袖。

政党间的门户之见,小团体主义都是不成熟的政治家素质差的表现。列宁在论证领袖对党的重要性时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⑦任何有所作为的政党无不如此,民政党能在檳城执政20年,该党领袖林苍佑成为全马十三个州中唯一的华人州长,这同林苍佑的个人威望有直接关系,他被认为是“个人声望高于党的形象”的政治人物。^⑧他在五十年代出任马华公会会长期间,提出改变马华公会依附巫统的政治路线,致力保护华社利益。因受到在巫统支持下的陈修信一股势力的反对而退出马华公会。

海外华人是一支商业队伍,擅长于经济。华人领袖实际上都是来自商界的杰出人物。正如陈修信所说,“一个好的商人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家”。^⑨最本质的一点,政治家必须具有献身精神和全局观念。党争不息反映了马华政治家缺乏这一品质,不仅有在朝和在野的政党间的争斗,同处执政阵线也是矛盾重重。同一个政党内部的权力、派系之争也连绵不断。马《星洲日报》“马华41年党争知多少”文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华公会的四次大斗争。这种斗争使党的元气大伤,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马华历年来党争不息,元气大伤,党的领导素质并没有在经过党争的洗礼后变得更团结、更健全、更加强,反而越来越不团结,士气低沉,整个党组织显得松散”。^⑩“影响所及整个华人社会信心日

损,甚至心灰意冷。”^⑪

“丑闻”是作为政治家所忌讳的。马华公会前秘书黄俊杰离开政坛前说,“马华领袖只要能够使自己干干净净,没有金钱丑闻,没有女人问题,便是成功了一半。”^⑫可见问题较为严重。

应该说,当前华人政治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存在尚待解决的问题不少,不面对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很难开创出新的政治局面,也难于适应新的形势。

五

进入九十年代,华人政治面临新的局面,新的形势。

九十年代后,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不再是马来西亚政府的主要任务,而为经济发展的任务所取代。马哈迪尔总理在1991年向议会所作“马来西亚迈向前路”为题的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把马来西亚建设成先进工业国,加入发达国家行列”。被称为“2020年宏愿”,强调“确保各民族经济平等,公平分配国家财富”的原则。^⑬在他出席1992年第二届全国华人经济大会的致词中提出,“未来华巫经济合作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真诚合作关系上,政府政策要公平惠及各族”。^⑭副总理加化峇峇还表示,“巫统将在30年内成为多民族政党”。^⑮表明经济建设的任务已提到首要地位,种族政治已淡化。

华人政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是:

第一,如何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为推动华人经济发展服务。

马来西亚政府提出发展经济的宏伟目标,无疑为华人在经济领域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新的机会。华人政党应把推动华人经济发展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在此之前,华人政党对华人经济并没有足够重视,没有成为党的重要任务。新加坡《联合早报》曾于1993年作如下评论,“华人经济力量如今仍在马华

(公会)之外,往往跟马华(公会)没有什么关系。”^⑤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华人经济实力增强,将进一步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增强华人政党的地位。如何在新时期促进华人经济的发展,是华人政治的重要课题,也是华人政党的主要任务。

第二,开创民主新局面仍是华人政党的另一重要任务。

在此之前,华人政党均围绕种族问题开展活动,企图通过政党的活动改变或影响种族政治的局面。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形势下,种族政治被淡化,但不是改弦易辙,被抛弃。冲破种族政治,消除它的影响,促进马来西亚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将仍然是华人政党的另一任务,尚需付出艰辛努力。

在种族政治开始淡化的情况下,华人政治所要谋求的是建立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以确保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同心同德共同建设繁荣富强的马来西亚。力戒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去反对种族主义。华人政党,首先它是马来西亚的政党。反对种族政治,首先它是危害马来西亚国家的利益,损害马来西亚人民,包括马来人和华人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三大华人政党均比较明确,马华公会一

贯把民族和睦置于首要地位。民行党和民政党一再声明自身是多元种族的政党。民行党极力宣传的“两线制”,目的也是企图以健全民主政治来突破种族政治的局面。新的形势要求华人政党必须提出平衡各族利益,协调各族关系,各民族均能接受的政治主张。这是华人政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三,只有华人团结才能开拓华人政治的新局面。

加强华人团结,消除不团结的因素是华人政治所面临的紧迫课题,任何一个期望在新时期有所作为的政党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三大政党并存的局面在一个时期内会继续存在。但结盟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三大华人政党间并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而且有华族共同利益的基础。处于对立地位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各方在小团体利益上后退一步,在大局整体利益上前进一步,就能走在一起。实现这一目标,只要各政党坦诚相见共同努力就能达到。在这基础上密切同华人社团的关系,把华社的力量凝聚起来,配合政党的努力。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华人在政治上将大有作为。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①郭鹤完谈话见〔马〕《星洲日报》1989年7月24日;教总领导人林玉势讲话,见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第353页。

②〔台〕《中央日报》1991年7月4日;〔马〕《工商世界月刊》1991年1月,第12页。

③〔日〕李国卿《东南亚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121页。

④李思涵“日军占领星洲检验之役考实”,《南洋学报》41卷,1.2期合刊。

⑤朱杰勤主编《新马华侨史》第451页。

⑥〔马〕《董总卅年》第319页。

⑦〔马〕《星洲日报》1952年1月8日。

⑧“商会与马来亚政制问题”,《南洋商报》1947年1月18日。

⑨〔马〕《星洲日报》1989年2月26日。

⑩“马华公会生日”,《华声报》1991年2月20日。

⑪⑫何启良“权威危机和协商困局”,〔马〕《星洲日报》1992年3月1日。

⑬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厦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⑭〔马〕《星洲日报》1949年2月2日;1951年1月18日。

⑮同⑭,第238页。

⑯《南洋商报》1958年9月6日。

⑰“离任福州联合总会会长的讲话”,《福建侨报》1992年1月26日。

⑱郭全强谈参政,〔马〕《星洲日报》1991年2月16

日。

⑩谢诗坚“华人政治思潮的演变”，〔马〕友达企业公司发行，1984年第272页。

⑪《福建侨报》1991年1月20日。

⑫〔菲律宾〕《世界日报》1992年7月1日。

⑬同⑩，第120页。

⑭同③，第93页。

⑮同上，第271页。

⑯刘文荣“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地位的演变”，台北世界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⑰同⑩，第166页。

⑱植廉贵谈华人政治，〔马〕《光华日报》1989年11月5日；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厦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⑲⑳林金狮谈话，〔马〕《光华日报》1991年11月27日。

㉑㉒“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马华人政治”，〔香港〕《华人》月刊1991年第1期。

㉓㉔李国卿《东南亚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表九”。

㉕同⑱，第162页。

㉖同⑲，第110—117页。

㉗廖小健“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演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2期。

㉘谢诗坚“华人政治思潮的演变”，〔马〕友达企业公司发行1984年，第46—69页。

㉙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第248页。

㉚《华侨史论丛》第四辑，福建华侨史学会发行，第104页。

㉛㉜“多元种族政治路途艰辛”，〔香港〕《亚洲周刊》1989年10月9日。

㉝新加坡哈辛·辛格“马来西亚的政治变化”，《南洋资料译丛》1992年第2期，第74页。

㉞〔马〕《光华日报》1989年11月5日。

㉟同⑲。

㊱《福建华侨志》上卷，第96页；〔马〕《光华日报》1989年11月5日。

㊲〔马〕《董总卅年》中册；〔马〕《星洲日报》1990年10月1日；1991年12月16日。

㊳同⑲。

㊴张景良谈话，〔马〕《星洲日报》1987年7月24日。

㊵《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0页。

㊶〔香港〕《亚洲周刊》1989年10月8日。

㊷同⑲，第185页。

㊸“马华41年党争知多少”，〔马〕《星洲日报》1990年7月28日。

㊹郭全强谈参政，〔马〕《星洲日报》1990年9月11日。

㊺“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马华人政治”，〔香港〕《华人》月刊1991年第1期。

㊻《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6月27日。

㊼〔马〕《星洲日报》社论，1992年8月28日。

㊽㊾〔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6月11、12日。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

(上海卷)出版

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林金枝教授编著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

(以下简称《选辑》)第三卷《上海卷》已于1994年10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选辑》(上海卷)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该书系作者到上海实地调查，结合档案和有关文件资料而编著的一部资料书，汇集了近代(1900—1949年)海外华侨、归侨在上海投资各种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资料。全

书40万字，分四篇十七章。第一篇总论对上海在全国华侨投资中的地位、近代华侨在上海投资历史的发展变化、投资特点、投资作用与经验教训等都进行了概括分析、论述和总结，对今天吸引外商投资很有借鉴作用；第二篇至第四篇则按产业部门(工业、商业、金融业)编辑与辑录有关具体资料。该书以辑录原始资料为主，每条资料均注明资料出处，以便读者引用。(夏南史)